

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三重困境与中国经验

□ 孙大伟, 高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哈尔滨技师学院, 哈尔滨 150036)

摘 要: 现代意义的风险是一种全球化风险, 具有复杂性、政治性和灾难性等特征。当前, 全球化风险治理面临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重困境, 即风险认知不到位、风险治理理念不统一、风险治理体系不健全。我国在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包括增加关于全球化风险的知识供给, 推进全球化风险的认知革命;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统合全球化风险治理理念; 牢固树立共同体意识, 健全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等措施。

关 键 词: 全球化风险; 风险治理; 共同体;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207 (2022) 01-0022-09

收稿日期: 2021-08-02

作者简介: 孙大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廉政学、社会学; 高阳, 哈尔滨技师学院教师, 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科研支持项目“重大突发事件防控中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2021030。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要“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指示。对于“风险”一词已是耳熟能详,但依然有必要对风险概念、风险发展趋势、风险特征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分析风险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一、现代意义的风险及全球化趋势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因此许多学科都在研究风险。英国学者马丁·因尼斯总结了社会科学内部存在的社会理论上的风险、文化理论上的风险和谱系学理论上的风险等三种不同的风险概念,^[2]认为风险是兼有危险、偶然、勇气、幸运、恐惧等意思的概念,与安全概念对立。在前现代社会,风险的本质在于物质匮乏,而到了现代社会,风险的本质表现为不确定性增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作为一场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给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风险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人类社会已经处于环境污染、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传染病疫情、核灾害威胁等现代意义的风险当中,且这些现代意义风险已经明显不是局部的风险,而是全球化的风险。

(一)现代意义的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风险社会学》一书中对于风险的概念进行了溯源:“这个词(风险)的词源已然不可考,许多人猜测源自阿拉伯语。人们在欧洲的中世纪契据中找到了这个词,但这个词被印刷出来,似乎首先见于意大利与西班牙。……重要的应用领域是航海与贸易。航海保险是有计划的风险控制的一个早期案例”。^[3]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观点:“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他们使用风险这个词来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4]由此可见,风险一词应源于航海活动。16和17世纪航海活动还是一个典型的冒险活动,既有可能给冒险的人带来丰厚的收入,又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失,所以人们都会尽可能地采取措施避免未来的损失,但要想避免未来的损失并不容易。尼克拉斯·卢曼认为:“一方面,未来的损失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从已然确定的现在出发,未来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未来会发生的一切又取决于现在采取的决定。因而只有在决定至关重要、不采取决定便会招致损失的时候,人们才谈及风险。”^[5]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为此,他还将“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称为“外部风险”,如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而将“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称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核战争等。^[6]

20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深入分析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7]弗兰克·奈特是从经济学视角分析风险问题的,这在一定意义上理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意义风险的全球化趋势

现代意义的“风险”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时认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8]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风险的全球化是一种平等化效应,当全球化的风险(例如生态危机)来临,全人类都是风险的承担

者,不分穷人或富人、白人或黑人、南半球人或北半球人、东方人或西方人,也不会因为社会区隔、关税壁垒或阶级社会而有所不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的全球化趋势包括风险强度和风险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9]在全球化的风险强度下,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风险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深受其害。而全球化的风险环境则表明,当今世界风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二、全球化风险的特征

现代意义的风险本身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全球化、技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同时也是风险的全球化。全球化风险根源于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社会现实,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等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风险的复杂性

全球化风险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全球化风险也具备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0]习近平总书记将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态势精辟地总结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变。具体体现在,当今世界局部冲突不断,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等等。

各种深刻的、突发的、强烈的变化相互叠加使世界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不稳定,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更为复杂。范如国论证了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内生复杂性、脆弱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复杂性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机理,并进一步总结提出全球风险社会六个方面的特征,即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风险、不可控及毁灭性风险、人为制造的“人化风险”、高度复合的系统性风险、具有平等性的风险、制度化的风险。^[11]如此看来,与可预测、稳定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频发的社会,这些都体现了全球化风险的复杂性。

(二)风险的政治性

从全球化风险的内容角度来看,全球化风险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风险不仅仅意味着人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很多时候还被赋予政治的意义,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发展和周边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也有可能演变为政治风险。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12]可见,对于全球化风险的政治属性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全球化风险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一旦现代化风险得到‘承认’(社会认知),它就能制造出空前的政治动力。‘承认’(社会认知)的过程牵扯到很多东西,不仅有围绕风险的知识,更有相应的集体知识和信念,已经由相关因果链带来政治启迪。”^[13]

蒋来用认为,当今社会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社会风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容易扩散,有些甚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突发事件大量并且经常发生,政治开始对各种风险进行关注和干预。^[14]

(三)风险的灾难性

从全球化风险引发的后果来看,全球化风险具有突出的灾难性特征。因为现代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一系列的世界性难题引发的全球性风险将会带来系统性、不可逆、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已经作出了深刻分析:治理赤字表现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信任赤字表现为“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和平赤字表现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发展赤字表现为“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15]现代社会面临的这些难题都是重大挑战、重大矛盾、重大阻力、重大风险,一旦触发底线,必将引发全球性的、灾难性的损失。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16]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风险,就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当前疫情还在肆虐,灾难仍在继续。因此,加强对全球化风险的治理势在必行。

三、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三重困境

(一)认识论方面的困境:全球化风险认知不到位

认识论是关于人的知识观的哲学理论,是对于事物及其本质的认知。马克思主义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研究认识论的相关问题,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知识、经验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又回到感性认识的复杂过程。当前,风险社会、全球化等概念已经为人所熟知,但长久以来,已有的风险意识主要是个人风险意识还没有上升到关系全人类命运的全球化风险意识。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化风险的认知不到位,也就很难看清形势、把握大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作。”^[17]因此,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第一重困境是全球化风险认知不到位带来的认识论方面的困境。

全球化风险认知不到位,意味着在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偏少:一方面,长期以来,虽然已经普遍承认诸如核战争能够带来毁灭性的全球化风险,但却是“二手的非经验”。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认为:“那时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屋里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在文明的危机意识的条件下,那个不可见之物,或者说那个原则上脱离感官的东西,那个只能在理论上进行关联和计算的东西,已经成为个体思考、感知和体验过程中不成问题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谈论风险意识的时候,我们着手处理的不是‘二手经

验’,而是‘二手的非经验’。”^[18]另一方面,经常被告知所面临的风险是多么严重,长此以往就容易使人厌烦。由于许多风险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存在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所以,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对于许多老生常谈的风险已经麻木甚至厌烦。^[19]

(二)价值论方面的困境:全球化风险治理理念不统一

价值论是关于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活动的方式及其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领域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的,价值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0]在全球化风险面前,全人类的利益、生存和发展均受到威胁。所以,全球化风险治理应立足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或地区利益,应就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理念达成共识,在统一的理念指导下开展共同行动。但是,如何达成风险治理的共识始终是一个难题。当前,世界各国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理念并不统一,各种理念之间还有冲突、对抗。“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悖论等问题均有表现,很多人抑或国家选择“搭便车”,缺少为全人类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精神。因此,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第二重困境是人们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理念不统一而带来的价值论方面的困境。

长期以来,各种逆全球化思潮已经严重影响了对于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国家中心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的悄然回归持续冲击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价值认同,“二战结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认同遭遇挑战,工具理性主宰下的排他性治理逻辑不断助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气焰,在西方选举政治的裹挟下赤裸裸地追求其狭隘的所谓民族和国家利益,将世界引入更为危险的境地。”^[21]个别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和保守主义文化,不惜接连“退群”“脱钩”,借此减轻国际义务。这些现象不利于全球化风险治理价值认同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2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瘴痼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个人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意识以及竞争、斗争的行为模式依然支配着人的生活和活动,并在风险社会中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风险。”^[23]

(三)方法论方面的困境: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不健全

方法论是关于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要科学地认识世界,更要科学地改造世界。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全球化风险的治理关键在于超越历史惯性和思维惯性、牢牢把握和主动变革方法论。当前,国际上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方法的理论研究比较多。有学者系统梳理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学者提出的、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方法相关的多种分析范式、框架模型和方法策略,归纳并总结了具体治理措施层面的相关要求:一是参与和协商并重,二是沟通与回应并举,三是技术与政治并用,四是问责与激励并行,五是防控与经济并进。^[25]但令人尴尬的是,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方法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从其在新加坡疫情防控的糟糕表现来看,这些理论成果并没有在全球化风险治理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当前美国等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方法论体系的研究成果以及

实际采取的措施并不能适应全球化风险治理的实践需要,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并不健全:“现有的风险治理方式无力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碎片化、低效率的治理体系与高度复杂、高度危险的全球风险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26]因此,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第三重困境是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建设不健全而带来的方法论方面的困境。

出现这种情形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方面,在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体制层面还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形。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殖民、战争等手段制定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规则,至今仍然牢牢掌控全球治理权;而一些国际组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高、作用发挥不足。另一方面,体制不公必然引发机制不彰。“现有的国际组织和规则体系也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全球风险的机制,难以同心协力。”^[2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28]

四、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中国经验

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目标是要破解全球化风险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重困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化风险治理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和巨大贡献,为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可供借鉴的实践参照。

(一)增加关于全球化风险治理的知识供给,推进全球化风险社会时代的认知革命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面临很多风险,为了防范并治理这些风险,人类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对于各种风险的认知能力。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等三大重要的革命。大约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让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29]也正是因为“认知革命”,智人由食物链的中间位置一跃而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发展为今天的人类。随后的农业革命、科技革命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科技革命使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人能够战胜其他竞争者、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是靠强壮的身体,而是靠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所以,如果人类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那么就意味着人类在这些领域将更容易遭遇风险、危害和损失,也就极易陷入全球化风险治理认识论困境当中。

在全球化发展迅猛的当今时代,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出现,这就要求必须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掌握全球化风险的产生原因、传播渠道、危害后果、防范治理、责任承担等各方面的知识,推动全球化风险时代背景下新的认知革命,这是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的基础一环。中国历来注重强化对全球化风险的分析、研究和认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重要论述:一方面,反复提醒告诫全党要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并且已经极具前瞻性地指出全球化风险的到来:“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30]另一方面,教育引导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全球化风险的考验,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不足、困难和挑战,看

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31]所以,身处全球化风险社会时代,主动增加相关知识供给,自觉推进自身的认知革命是人类社会继续进步的必然之选。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统合全球化风险治理理念

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如果导向出了问题,结果就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人类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来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信奉对强者有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在全世界强行推广。显然,这种做法不仅无益于全球化风险的治理,反而会带来诸如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新的全球化风险。所以,如果世界各国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认识、防范和治理全球化风险,而是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政、各搞一套,那就极易陷入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价值论困境当中。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面对全球化风险,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不是孤岛,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各种全球化风险挑战。而要团结起来、合作共赢就必须统和全球化风险治理理念,引领全人类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和命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2]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3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彰显了理论科学性和伦理正义性,理应成为全球化风险治理的正确价值观。

(三)牢固树立共同体意识,健全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

破解全球风险治理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困境,能够为全球化风险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并明确方向。而要具体解决全球化风险问题,必须依靠科学方法论以及根据实际情况的变革方法论,这是破解全球化风险困境的最后一环。从历史上看,方法论革命在自然科学领域显得尤为明显:“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论》,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系统工程方法、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方法,科学研究的战略工具箱日渐充盈。当前科学研究四大支柱性方法并存的局面正在浮现:以记录和描述自然现象归纳为主的‘实验科学’、利用模型演绎的‘理论科学’、对复杂现象进行模拟仿真的‘计算科学’和颠覆人类思维惯性的‘数据密集型科学’。”^[34]自然科学领域的前沿科学技术和方法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认识、防范和治理全球化风险。但由于全球化风险具有复杂性、政治性和灾难性等特征,仅仅运用某一种或某一方面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否则,极有可能陷入全球化风险治理的方法论困境。

要有效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的方法论困境,必须坚持从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全球化风险治理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理顺全球化风险治理体制不公的阻滞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当今时代“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5]尽管全球化遭遇挑战,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之间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关系。面对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36]“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

体”“人文共同体”^[37]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38]等理念,主张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39]另一方面,要按照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的规律治理,推进科技创新、完善制度、强化责任,消除

全球化风险治理机制不彰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并指示要“完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40]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实行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41]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生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要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42]始终坚持共同体意识,着力健全完善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是走出“全球化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 [1][3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
- [2](英)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与社会秩序[M].陈天本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 [3][5](德)尼克拉斯·卢曼.风险社会学[M].孙一洲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
- [4][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 [7](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化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9][1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0][12][15][17][3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J].中国社会科学,2017,(2).
- [13][16][1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化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14]蒋来用.监督体系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缺陷与修补[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 [20][24][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1]章娟.风险社会视阈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9(09).
- [22]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8-11-18(02).
- [23]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价值选择[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5).
- [25]张大维.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略——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视角[J].国外社会科学,2020,(5).
- [26]黄杨森,王义保.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观照与中国方案[J].中国软科学,2020,(8).
- [27]肖祥.风险社会治理责任范式:全球战“疫”与中国行动[J].学术界,2020,(9).
- [28]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9](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30]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1][3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4]王小理.牢牢把握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方法论[N].学习时报,2017-06-21(A7).
- [3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7]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1-11(2).
- [3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求是,2021,(1).

[40]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J].求是,2020,(6).

[4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

[4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马海龙)

On the Triple Dilemma of Global Risk Governance and China's Experience

Sun Dawei, Gao Yang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a risk society. Risk in modern sense is a kind of global risk,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ity, politicization and disaster. At present,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faces three dilemmas: epistemology, axiology and methodology, that is, the cognition of globalization risk is not in place,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is not unifi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China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solving the dilemma of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knowledge about globalization risk, promoting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risk, carrying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mproving the globalization risk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isk; risk management; triple dilemma; chinese experience